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译丛
Chines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经济相互依赖 与战争

[美] 戴尔·科普兰 (Dale C. Copeland) 著

金 宝 译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经济相互依赖 与战争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 / (美) 戴尔·科普兰
(Dale C. Copeland) 著; 金宝译. -- 北京: 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 2018. 3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译丛)

书名原文: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ISBN 978 - 7 - 5201 - 1679 - 4

I. ①经… II. ①戴… ②金… III. ①国际关系学 -
研究 IV. ①D8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60145 号

·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译丛 ·

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

著 者 / [美] 戴尔·科普兰 (Dale C. Copeland)

译 者 / 金 宝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刘学谦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分社 (010) 59367004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36.25 字 数: 483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1679 - 4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6 - 4875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16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译丛
Chines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经济相互依赖 与战争

[美] 戴尔·科普兰 (Dale C. Copeland) 著

金 宝 译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by Dale C. Copeland,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2015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本书根据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译出

序 言

本书层次丰富，因此可从不同角度阅读。首先，本书探讨的问题是，在何种条件下，贸易和投资的流动容易促使大国维持和平，或走向军事化冲突，甚至战争。其次，在另一个层面上，本书旨在考察大国如何考虑经济交流的问题，以及经济交流对其发展全球力量、维护长久安全会起到何种作用。最后，本书是要研究在近代世界史发展进程中，商业和非商业的因果要素相对彼此的突出性。以最后一点而论，本书隶属于一项较为广泛的研究，其目的是确定关于战争的各种理论（从经济角度或其他角度出发）是否经常能够有效解释国际和平如何转变为险恶的危机和战争，或者持续不断的冷战如何转化为稳定的和平局面。通过全面考察 1790 ~ 1991 年的重要大国案例，本书首次大规模检验了外交史上各种因果要素的相对重要性。因此，其研究结果应该对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都有参考价值。此外，本书还考虑了定量研究学者的前沿成果，从而指出了本书观点对大小国家具有的广泛意义。

本书要讨论两百年的大国历史，篇幅很长。因此，不同的读者阅读本书，方式可以不尽相同。主要关注国际关系理论和政治学的读者，不妨仔细研究前三章，然后再根据兴趣，选读第三至第八章中的某些案例。主要关注外交史的读者，只需读完绪论的前半部分，便可直奔案例研究，以及最后一章关于当代中美关系的讨论。我把 1790 ~

1899 年的欧洲案例放在了靠近本书结尾处，原因不过是关于这个时期的现存资料较少，而这容易使我们受到限制，不便于检验不同因果机制的相对合理性。尽管如此，读者如果喜欢按年代顺序阅读，不妨从第七章、第八章开始，再回到第三至第六章，研究动荡的 20 世纪出现的各个案例。

本书探讨的主题历时甚久，写作过程亦复如是，还有众多人士需要感谢。首先，我想感谢在各次研讨会上对本书各章初稿提出意见的诸君，他们的名字我当时并不知道，或者后来忘记了。这些研讨会的举办方包括：哈佛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芝加哥大学国际和平、经济与安全项目，俄亥俄州立大学默尚中心，哥伦比亚大学与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系，乔治敦大学政府系。我尤其要感谢得克萨斯大学举办的“孤星论坛”。当时我的手稿已快要完工，即将送出评审。我借此论坛，利用周末时间和与会同仁就其中的关键章节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参考他们提出的意见，修改了多处错误。

我想感谢鲍勃·阿特、詹姆斯·费隆、海因·戈曼斯、安德鲁·基德、杰克·列维、查尔斯·李普森、迈克尔·马斯坦杜诺、约翰·米尔斯海默、伊多·奥伦、邓肯·斯奈德、史蒂芬·沃尔特，他们帮助我修正了最初理论体系的各处缺陷。我要感谢以下诸位对具体章节和我的方法论提出了宝贵意见：黛博拉·布卡雅尼斯、蒂姆·克劳福德、麦克·德什、丹·金格里奇、尤金·戈尔斯、大卫·勒布朗、杰夫·勒格罗、斯蒂芬·罗贝尔、艾伦·林奇、埃德·曼斯菲尔德、凯文·纳里兹尼、约翰·欧文、索纳尔·潘迪亚、诺林·李普斯曼、伦·肖帕、赫尔曼·施瓦兹、兰迪·施韦勒、托德·赛其瑟、杰夫·塔利亚费罗、大卫·沃德纳、布兰特利·沃麦克。在弗吉尼亚大学，我有幸与多位聪慧的研究生合作，他们在本书写作的不同阶段提出了精辟的意见。他们是：凯伦·法瑞尔、凯尔·海因斯、德雷克·金、

凯尔·拉斯库雷茨、汤姆·莫里亚蒂、卡拉·翁、约瑟夫·莱利、麦特·斯克洛格斯、吴玉锦（音）、布兰登·约德尔。我在这里还要特别感谢迈克尔·波兹南斯基，他对本书多章提出了入木三分的批评。

最后，我要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各位匿名审稿人，他们对本书提出了广泛而有益的意见。在他们的深刻建议下，我修正了多处瑕疵，希望终稿与起初相比已经有了很大改善。我后来得知，其中一位审稿人是弗兰克·加文。他对本研究项目较为广泛的外交历史意义提出的一些见解，尤其令我受益匪浅。

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父母，克雷尔·G. 科普兰和芭芭拉·E. 科普兰。他们在本书付印之前已经去世，但在我多年写作本书期间，他们始终如一地给予支持，我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我将本书献给我的爱侣娜塔莎·科普兰，以及我两个可爱无比的孩子，利亚姆和卡佳。一言以蔽之，是你们使生活有了意义。

主要文献与资料来源缩写

美国1905 ~ 1991

CIA (CWE) 《冷战尾声：美国 1989 ~ 1991 年对苏联及东欧情报工作》，本杰明·B. 费舍尔编（华盛顿特区：中央情报局，1999）。

CIA (HT) 华纳编：《中情局冷战记录：哈里·杜鲁门治下的中情局》（华盛顿特区：中央情报局，1994）。

CR 华伦·F. 金博尔编：《丘吉尔与罗斯福通信全集》，三卷本（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4）。

CWIHP 华盛顿特区“国际冷战史项目”。

CWIHPB 《国际冷战史项目简报》，第 1 ~ 11 期（华盛顿特区：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1992 ~ 1998）。

DDEL 堪萨斯州阿比林市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图书馆。

DSB 《国务院简报》（华盛顿特区：美国国务院，各年）。

FCY 商务部：《对外贸易年鉴》（华盛顿特区：美国商务部，各年）。

FD 《弗雷斯特尔日记》，沃尔特·米利斯、E·S. 达菲尔德编

(纽约: 维京出版社, 1951)。

FDRL 纽约海德公园富兰克林·D. 罗斯福图书馆。

FDRPL 埃利奥特·罗斯福编:《罗斯福 1928 ~ 1945 年私人信件》
(纽约: 杜埃尔 - 斯隆 - 皮尔斯出版社, 1950)。

FRUS 《美国外交关系》 (华盛顿特区: 美国政府印刷局, 各年)。

FRUSJ 《美国外交关系: 日本》, 两卷本 (华盛顿特区: 美国政府印刷局, 1943)。

FTP 奥维尔·H. 布利特编:《罗斯福与威廉·S. 布利特私人秘密通信录》(波士顿: 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 1972)。

HSTL 密苏里州独立市哈里·S. 杜鲁门图书馆。

JFKL 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约翰·F. 肯尼迪图书馆。

JFKLNSF 约翰·F. 肯尼迪图书馆国家安全档案。

KT 威廉·伯尔编:《基辛格与中苏政府绝密谈话录》(纽约: 新兴出版社, 1998)。

LC 华盛顿特区国会图书馆。

MB 《珍珠港事件的“魔术”背景》, 第 1 ~ 5 卷 (华盛顿特区: 国防部)。

MH 斯维特拉娜·萨伏兰斯卡娅、托马斯·布兰顿、符拉迪斯拉夫·祖博克编:《历史的杰作: 冷战在欧洲的终结》(布达佩斯: 中欧大学出版社, 2010)。

NA 马里兰州学院园市美国国家档案馆。

NSA (BC) 国家安全档案:《1958 ~ 1962 年柏林危机》, 缩微胶片 (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 查德威克 - 希利出版公司, 1991)。

NSA (SE) 国家安全档案:《苏联评估: 美国对苏分析, 1947 ~ 1991》, 缩微胶片 (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 查德威克 - 希利出版公司, 1995)。

PHA 《袭击珍珠港：袭击珍珠港联合调查委员会听证记录》，第1~39卷（华盛顿特区：政府印刷局，1946）。

PHST 罗纳德·沃斯编：《珍珠港：国会听证会（1945~1946）完全索引证词选编及袭击前事件先期调查》（北卡罗莱纳州杰菲逊市：麦克法兰出版公司，1993）。

PWP 唐纳德·M. 戈德斯坦与凯瑟琳·V. 迪隆编：《太平洋战争文件：日本二战档案》（华盛顿特区：波托马克出版社，2004）。

RC 弗朗西斯·L. 罗文海姆、哈罗德·D. 兰利、曼弗雷德·乔纳斯编：《罗斯福与丘吉尔战时秘密通信录》（纽约：达·卡波出版社，1990）。

RF 杰森·萨尔托恩-埃宾编：《里根档案：里根冷战绝密行动记录》（加州太平洋帕利塞德市：自行出版，2010）。

UECW 国家安全档案：《理解冷战的终结：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年代》（为口述历史会议准备的简报册，罗德岛普罗维登斯布朗大学，1998年5月7~10日）。

欧洲1790~1941

CN 《拿破仑一世通信录》，第1~32卷（巴黎：皇家印刷厂，1858~1870）。

DNL R. M. 约翰斯顿编：《拿破仑生平自述日记》（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1910）。

EHS B. R. 米切尔编：《欧洲1750~1975年历史统计数据》，第二修订版（纽约：资料档案出版公司，1980）。

FPVE 肯尼思·波恩编：《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外交政策（1830~1902）》（牛津：克拉伦顿出版社，1970）。

GDD E. T. S. 达戈斯戴尔编：《德国1871~1914年外交文件》，

第1~4卷(纽约:哈珀兄弟出版公司,1931)。

GM 亨利·里夫编:《格林维尔回忆录:乔治四世、威廉四世、维多利亚女王执政时期日记》(伦敦:朗曼格林出版公司,1896)。

HP 诺曼·里奇与 M. H. 费舍编:《荷尔斯泰因文件》,第1~4卷(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55)。

NDR 杰里米·诺克斯与乔弗里·普里丹编:《1939~1945年纳粹主义文件读本》,第1~3卷(埃克塞特:埃克塞特大学出版社,1983~1988)。

NL J. M. 汤普森编:《拿破仑信件》(伦敦:普里昂出版公司,1998)。

NLN 玛丽·劳埃德编:《拿破仑一世信件新编》(纽约:阿普尔顿出版公司,1897)。

日本1870~1941

DAFP W. J. 哈德逊与 H. J. W. 斯托克斯编:《澳大利亚外交政策文件,1937~1949》,第五卷:1941年7月~1942年6月(堪培拉:澳大利亚政府出版局,1982)。

DJ 鹿岛守之助编:《日本外交史》,第一、二卷(东京:鹿岛世界和平研究所,1978)。

HYSJE 《日本经济百年统计》(东京:日本银行,1966)。

JDW 池信孝编:《日本战争决策:1941年政策会议记录》(加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7)。

JGEACS 乔伊斯·C. 勒布拉编:《二战中的日本大东亚共荣圈文献档案选读》(吉隆坡:牛津大学出版社,1975)。

RJDE 约翰·阿尔伯特·怀特:“1901~1904年俄日外交往来”,《日俄战争外交史》附录1(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4)。

111	（1891~1911）市参事大由升国常等因寄	章八第
114	及恩伯兵部片本	章八第
117	修文类稿	
118	尼 索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理论	19
第二章 定量分析与定性案例分析研究	62
第三章 日俄战争与德国霸权战争（1890~1939）	110
第四章 珍珠港序曲：日本安全与北方问题 （1905~1940）	164
第五章 苏联问题与太平洋战争之始 （1941年3月~12月）	208
第六章 冷战的起源、动态与结束（1942~1991）	280
第七章 欧洲大国政治（1790~1854）	367

第八章 帝国扩张时代的大国政治（1856～1899） 432

第九章 本书观点的意义 496

参考文献 518

索引 543

绪 论

大国在经济上相互依赖，对其相互之间发生战争的概率，是否有重大影响？如果有，那么究竟是会让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有所减少，还是有所增加？如今，美国、中国、印度、俄罗斯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往来不断达到新的高度，而人们却担心，各国今后是否会竞相争夺原料、投资和市场？在此背景下，上述问题重新变得重要起来。过去二十年中，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和著作数量成倍增长。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关于各国贸易往来和战争的关系，仍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许多学者，甚至是大部分学者，都赞同传统的自由主义观点，得出的结论是：相互依赖的确是一个关键的因果要素，能够大大降低国家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然而，有些学者却认为，这种观点的论据比较模棱两可；其实，与引起冲突的其他原因相比，经济相互依赖是微不足道的，或者非但不会降低发生战争的概率，反倒往往使战争更容易发生。

本书之目的，正是要解决这一争论。这里提出的观点是：商业因素对于战争爆发的重要影响，远远超出了争论双方预先设想的程度；不仅如此，商业因素还会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贸易和投资往来确实能够降低大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这符合自由主义者的观点。

然而，同样是因为相互依赖，各国之间却也可能产生危机或爆发战争，这又符合自由主义反对者的观点。于是，真正需要解决的难题变成了这样：各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纽带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会带来和平，或引起军事冲突？为解决这个难题，有些学者已经撰写了著作，利用大样本集合，找出还有哪些因果要素会和“相互依赖”这个要素相互作用，使各国倾向于和平或战争。遗憾的是，对于这些附加的因果变量，虽然有了一些实证分析，但要将其作用解释清楚，尚需演绎理论，这方面的进展就相对落后了。就实证相关性而言，政权类型、资本主义，以及发展水平都会产生重要的协同作用，决定着经济相互依赖对于发生战争之可能性的影响。这一点现在似乎已经清楚了。但我们还不知道，这些因素究竟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作用？也就是说，这些因素实际上是怎样产生我们看到的因果效应的？

- 为解决关于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的大部分悬而未决的问题，本书提出了一种演绎理论。自由主义者指出，有了商业纽带，行为主体就有了很大的物质激励，想要避免战争；现实主义者认为，这种纽带同时也会给国家带来脆弱性，反倒促使其领导人走向战争。本书的论点是这两种看法的融合。自由主义者认为，贸易和投资往来会提高开战的机会成本，因为一旦打仗，许多很有价值的商业关系就断绝了。这个观点是有道理的。但现实主义者认为，有了商业纽带，国家反而会处于弱势；因为一个经济体如果将自己重新定位，开始依赖国外的关键市场和货物，那么一旦对方中断贸易，则己方必受重创。这个观点同样是正确的。

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两种预测，究竟哪种会占上风？要做出判断，就必须再引入一个因果变量，也就是国家对于未来贸易与投资环境的预期。假如一个经济上依赖他国的国家对于这种未来环境的预期是正面的，那么它往往能够对维持当前和平的种种好处，以及开战带来的机会成本一览无余。这样一来，经济相互依赖就成了促进和平的力量。然而，如果这样的国家对未来经济环境的预期是负面的，认为

自己将无法与外国进行贸易，也得不到外国的投资，或认为外国贸易和投资很快就会被其他国家中断，那么现实主义的逻辑就会起作用。这样的国家往往认为，如果不能得到关键的原料和投资，进入不了重要的出口市场，其经济将无法健康发展，和抵抗力较强的行为主体相比，就要开始衰落。假如该国预计自己会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那么其领导人就会认为，两害相权取其轻，战争是合情合理的选择。也就是说，与其听凭国家衰落，日后在崛起的国家面前被动挨打，或被迫顺从，倒不如打上一仗。

这种论点，我称之为“贸易预期理论”，将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和出于安全考虑的预防性战争问题联系了起来^①。在此前的论著中，我提出过，历史上关键的大战，绝大多数都源于恐惧衰落——占支配地位的军事大国担心，除非发动预防性战争，且宜早不宜迟，否则崛起的大国就会赶超上来（Copeland, 2000b）。在此基础上，本书做了两点扩充。首先，不是只研究一个大国与整个体制一决高下的主要战争，或曰“大战”，而是探讨大国之间普遍意义上的各种冲突。换言之，既包括主要战争，也包括大国可能陷入的有限战争与危机。因此，任何形式的冲突，只要大国之间确实可能爆发战争，本书的论述几乎都要涉及。我将研究自1790年以来的所有大国冲突案例，既包括确实引起战争的冲突，也涵盖引起重大斗争和危机的冲突，这种斗争和危机增加了发生战争的概率^②。通过广泛研究大国案例，包括不

① 论述预防性战争的文献现已卷帙浩繁，关于此类文献的概要和参考资料，见 Levy, 2008；Weisiger, 2013。

② 将因变量设定为连续性变量，即发生战争的概率，而不是二元对立的战争与和平，其优势显而易见。在理论方面，一旦这样设定，理论就必须解释国家行为的严厉程度，怎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了重大变化，如从接触演变为强硬遏制，或由遏制转为开启严重危机（或者相反）。在实证研究方面，可以迫使人不仅研究局势非常紧张的阶段，也研究和平时期，从而避免“根据因变量做选择”（就是只考虑发生战争和危机的时候）的危险。